

《管子注》三论

耿振东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241)

[摘要] 《管子注》是《管子》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文章首先对与《管子注》有关的作者、卷数及“轻重”篇注解问题进行讨论,其次简述了《管子注》的内容及特点,最后对其在《管子》研究史上的地位作出尝试性评价。

[关键词] 《管子注》; 作者; 卷数; 轻重; 注文; 地位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6-0085-04

《管子》是战国中后期齐国管仲学派的著作结集,这是一部集诸子学说之大成的学术著作。罗根泽说《管子》“在先秦诸子,衰为巨帙,远非他书可及。……各家学说,保存最伙,论发甚精。”^[1]《管子》以其兼容百家的性质在先秦诸子中占有重要地位。历史上较早对《管子》予以关注并对其作出评述的是战国末期的韩非。之后,西汉的贾谊、晁错、桑弘羊、司马迁、刘向,魏晋之际的傅玄、齐梁时期的刘勰,或从政治、军事、经济的角度,或从《管子》成书、辨伪、文辞的角度,对其作过不同程度的诠释。这些都体现了《管子》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以注释形式对《管子》文本作深入研究的,是唐朝尹知章的《管子注》。

本文拟对与《管子注》有关的三个问题加以论述。

一 关于《管子注》的作者、卷数和“轻重”篇注文

刘向编校《管子》86篇,大概此时并未分卷。《管子叙录》说,“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2]按两汉抄录古籍的常例,书之于竹简的称之为篇,书之于竹帛的称之为卷。章学诚曾说,“向歆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3]《管子》既然是“杀青而书”,可知是书之竹简,刘向以篇计自在情理之中。

《管子》86篇分为18卷,至迟在南朝的梁时已经出现。梁庾仲容曾摘录诸子要语成《子钞》十卷。该书虽佚,宋高似孙《子略》录有《子钞》目录,其中《管子》正为18卷。之后,又有19卷本出现。《隋书·经籍志》就曾著录“《管子》十九卷”^[4]。但这两种不同卷数的本子大概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是后者多出一卷“序言和目录”而已。^①

《管子》原为86篇,但唐初已有散逸。《四库全书总目》说:“考李善注陆机《猛虎行》曰:‘江邃《文释》引《管子》云:‘夫士怀耿介之心,不荫恶木之枝,恶木尚能耻之,况与恶人同处。’今检《管子》近亡数篇,恐是亡篇之内而遽见之。’则

唐初已非完本矣。”^[5]在此基础上,有的学者对唐初之前各类典籍征引《管子》的情况作了进一步梳理,初步得出了“南北朝人,‘尚见《管子》原书’;隋代《管子》已不是全本,不过比今本内容要多;至唐初《管子》的编排和内容就已经和今本一致”的结论。并且说,“在南北朝后期,很可能就是在侯景之乱与梁元帝焚书中,《管子》的部分内容亡佚了,因此,虞世南编撰《北堂书钞》时,所见《管子》已非全本;隋末唐初,《管子》又有一些篇章亡佚,唐初魏征等编撰《群书治要》时,《管子》佚篇已经全部亡佚。”^[6]

根据以上研究成果,尹知章据以作注的《管子》已经不是86篇的足本了。

尹知章,绛州翼城人,“少勤学”。唐中宗神龙年间为太常博士,唐睿宗时礼部员外郎,后为国子博士。曾在秘书监与诸学者刊定经史。史载“知章虽居吏职,归家则讲授不辍,尤好《易》及庄、老玄言之学,远近咸来受业。”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卒。其“所注《孝经》、《老子》、《庄子》、《韩子》、《管子》、《鬼谷子》,颇行于时。”^[7]

《管子》原为十九卷无注本,经尹知章作注后增至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曰:“《管子》十九卷,管仲。……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8]但尹注《管子》不久,此三十卷注本便亡佚了十一卷。时人吴兢在其《西斋书目》中说:“凡书三十卷,今存十九卷,自《形势解》篇而下十一卷已亡。”^[9]关于亡佚的问题姑且不论,尹知章注释了《管子》是一个历史事实。因为除了史书《列传》、《艺文志》中有明确记载外,私人书目亦有著录。而且,史书所载为《管子》作注的除了尹知章,别无他人。但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用的唐杜佑《管氏指略序》却说:“唐房玄龄注。”此外,《郡斋读书志》著录的《管子》注本也由十九卷残本变为了二十四卷的完本。^[10]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宋郑樵《通志》除了《管子》“十九卷,唐尹知章注,旧有三十卷”的介绍外,亦有《管子》“二十

[收稿日期] 2008-10-26

[作者简介] 耿振东(1973-),男,山东淄博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

四卷,唐房玄龄撰”的著录。^[11]

晁公武与郑樵都是经历了靖康之难的南北宋之交的学者,主要活动于宋高宗时期。从其著作中对《管子》的记载来看,不但《管子》注本以完整的二十四卷本形式出现,且注者也由尹知章变为了房玄龄。郑樵《通志》同时著录房注《管子》与尹注《管子》,它们之间有何异同,郑樵并未说明。尽管存在种种困惑,有一个事实却是显而易见的,即当时题名为房玄龄的二十四卷本的《管子》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了。房玄龄早于尹知章七十年(以卒年计),新旧《唐书》多次提到房玄龄,均无房注《管子》的任何记载。房注《管子》之说始于房玄龄之后近一百七十余年(以卒年计)的杜佑。而从杜佑“恐非玄龄,或云尹知章”^[12]的不能确信的口吻,他对房注《管子》之说也表示了怀疑。对此,《四库全书总目》解释说:“旧有房元龄注,晁公武以为尹知章所托。然考《唐书·艺文志》,元龄注《管子》不著录,而所载有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则知章本未托名,殆后人以知章人微,元龄名重,改题之以炫俗耳。”^[13]四库馆臣作出这样的一种推测是合乎情理的。

尹知章《管子注》三十卷,后亡佚了十一卷。那么余下的十九卷注本何以变为了二十四卷的完本呢?对此,学者们多认为,二十四卷本中的前十九卷原文及注是尹注十九卷残本,后五卷中的原文则来自十九卷《管子》无注本中的相关篇章。而且,尹注亡佚了的十一卷,大概正合无注本的后五卷。于是,人们以无注本的后五卷补充亡佚了的尹注十一卷,尹注《管子》便由十九卷的残本变为二十四卷的完本了。那么,补充进去的后五卷中,其注释文字又从何而来呢?有学者认为,后五卷的注释源于杜佑《通典·食货》中的注文,而《通典·食货》中的注文“均尹《注》之旧”,二者注文中“有出入者,则传钞讹脱。”^[14]又有学者提出,二十四卷《管子》的后五卷注释源于杜佑《通典·食货》的注文,而《通典·食货》注文是杜佑自注。即是说,拼合《管子》为二十四卷的人考虑到后五卷无注,便从《通典·食货》中相对应的《管子》部分辑出杜佑之注,加入了二十四卷的《管子》之中。^[15]相比较而言,前一种观点的可能性更大。后一种观点尽管认为,“《轻重》注文都见于《通典》之注,而后者的注文有些不见于《轻重》之注;杜佑说‘无人注解’,已明言注文为其所自出”^[16],但这两条理由有待进一步修正。《轻重》注文与《通典》注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后人对《通典》之注加以增删、缩略的结果,这正如杜佑在援引其它典籍注解时也经常增删、缩略一样。仅凭二者的注文孰多孰少,不能确定何者出于抄袭。据《通典》注文中“无人注解”之语,得不出注文出于杜佑的结论。尹知章注《管子》是一个事实,即使三十卷的《管子》注本在杜佑时已亡佚了十一卷,杜佑也绝对不会因为亡佚的原因否认尹知章曾为后十一卷作过注解。既不否认,杜佑又如何会说出“无人注解”之语?很明显,注文之中的“无人注解”明是尹知章之注语。^[17]

然而,杜佑《通典·食货》采用了“尹《注》之旧”的说法也有待进一步阐释。吴兢曾说“凡书三十卷,今存十九卷,自《形势解》篇而下十一卷已亡。”^[18]既已亡佚,之后的杜佑又

如何能见到“尹《注》之旧”呢?可能的解释是,当时有三十卷《管子注》别本流传,此别本吴兢未曾见到,而杜佑却得以窥见。不过,杜佑见到的已经是改题为房玄龄的注本了。所以,他在《管氏指略序》中说:“唐房玄龄注。”杜佑据此别本为《通典》作注。此后,三十卷的《管子注》别本也亡佚了。拼合《管子注》为二十四卷的人,正是利用《通典》之注弥补了《管子注》之缺。在还原《管子注》的过程中,拼合之人对《通典》注文作过改动,最终导致二者在文字上略有差异,但其大略毕竟相同。

二 《管子注》体现的《管子》文本研究

《旧唐书·尹知章传》说“知章虽居吏职,归家则讲授不辍。尤好《易》及庄、老玄言之学,远近咸来受业。”^[19]尹知章曾为《老子》、《庄子》作注,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他对老、庄玄言之学的喜好,大概与其聚徒讲学以为讲授底本有关。《管子》中有许多谈论法理的文章,尹知章又为《韩子》、《管子》作注,似可看出他对法家思想也是重视的。唐中宗时,知章“以公站弃官。时散骑常侍解琬亦罢职归田园,与知章共居汝、洛间,以修学为事。”^[20]玄宗时,马怀素有感“古书近出,前志阙而未编”,上奏“括检近书篇目,并前志所遗者,续王俭《七志》,藏之秘府。”“上于是召学涉之士国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录,并刊正经史,粗创首尾。”^[21]《管子注》或许就在“弃官”“修学”与“刊正经史”期间完成。

注释体文本研究包括的内容很广,标注字音、辨识词义、串通文意、分析语法、说明典章制度与史实、解释典故、校勘正误、分析篇章结构、解题、评论原文等都在注释的范围之内。就尹知章《管子注》而言,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 标注字音

尹知章标注字音多用反切,少用直音。他在注音时,或标明所注之字,然后再以某某反、音某、读为某的形式出现,如:《管子·五辅》^②“下愈覆鸷而不听从”:“鸷,敕吏反。”“利陂沟,决潘渚”:“潘,音翻。”《宙合》“以琅汤凌轹人”:“琅,音浪。汤,音场。”或直接以某某反、音某的形式紧跟正文中所注之字,如:《宙合》“讷充末衡”,“讷”字后注“史县反。”《小匡》“诸侯之使垂囊而入,攬载而归”,“攬”字后注“丘粉反。”尹知章又常把对字的释义与注音放在一起。多数情况下,他是在释义后再注音,如:《五辅》“敦蒙纯固以备祸乱”:“蒙,厚也。音莫江反。”《任法》“昔者尧之治天下也,犹埴已埴也”:“埴,和也。音羸。”也有注音后再释义的,如《法法》“毋赦者瘞睢之矿石也”,“瘞”字后注“徂禾切,瘡也。”《地员》“其草兢于蓄”,“音蓄。草名。”

(二) 解释词义

解释词义也就是文字训诂。尹知章释义偶用音训之法。音训,或曰声训、因声求义,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解释词义。如:《形势》“渊深而不润,则沈玉极矣”:“极,至也。”《法法》“上无固植”:“植,志。”“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擅,专也。”《管子注》对词义的解释主要还是用义训之法。《中匡》“请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称。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号致之。”《霸形》“削方墨笔”:“方,谓版牍也。”《霸言》“邻国皆险,己独易,国非其国也”:“易,平易,不

牢固,谓无守御之备也。”《戒》“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物,谓名利之事。”尹知章对一些古字也作了辨析。《宙合》“天涓阳,无计量”:“涓,古育字。天以阳气育生万物,物生不可计量也。”《君臣上》“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罅制”:“罅,古准字。准,节律度量也,谓丈尺各有准限也。”《小问》“意者君乘驳马而澹桓,迎日而驰乎”:“澹,古盘字。”

(三) 串通文意

尹知章在解释词义的基础上,还对《管子》的文句进行了串通。这在《管子注》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如《形势》“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虽复静然不言,庙堂之政既以修理矣。”《枢言》“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日者,万物由之以煦,万象由之以显,功莫大焉,故谓之道也。心者,万物由之以虑,万理由之以断,云为莫大焉,故谓之道。”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下》中说:“夫《诗》之流别,盛于战国之文,所谓长于讽喻,不学《诗》,则无以言也。然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22]《管子》作为一部先秦诸子之作,自然也带有“深于取象”的文体特征。因而,阐明喻义,揭示文字所要表达的真正内涵,就成为《管子注》串通文意的一项内容。《形势》“平原之隰,奚有于高?大山之隈,奚有于深”,尹注曰:“言平隰之泽,虽有小封,不成于高。喻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隰,下泽也。隈,山曲也,言山即大矣,虽有小隈,不成为深。喻人有高行,虽有小过,非不肖也。”《君臣上》“如天雨然,泽下尺,生上尺”,尹注曰:“泽从上降,润有一尺,则苗从下生,上引一尺。泽下降,苗上引,犹君恩下流,人心中就上。”《小称》“毛嫫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气于面,不能以为可好”,尹注曰:“嫫,施虽美,而面有怨气,亦不能为可好。喻圣人外见其恶,亦不得美名。”

《管子注》串通文意的一个特点是借用历史传说、史实或援引典籍。《立政》“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兼爱之说胜,则徐偃弱而行仁,宋襄惑而慕古也。全生之说胜,则王孙自奉千金,何侯日食一万。”周穆王时,徐国国王徐偃为使百姓免遭战火涂炭而弃国逃亡;楚郑交战,宋襄公“不鼓不成列”,终至“兵败”而“伤股”^[23]。这些都是行“兼爱之说”的弊端。孔颖达《尚书正义·尧典》疏亦曰:“若宋襄慕义,师败身伤,徐偃行仁,国亡家灭,斯乃不考之失。”^[24]汉武帝时杨王孙“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死时却让家人将其“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25],何侯于“尧时隐苍梧山,慕长生,三百余口耕耘”^[26],此皆持全生之说所致。这是借用史料以串通的例证。此外,尹知章又注重援引典籍以串通。《七法》“不明于象,而欲论材审用,犹绝长以为短,续短以为长”:“鹤胫非所断,兔胫非所续也。”此援引《庄子·骈拇》“兔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27]的语句而略微简省之。《大匡》“公子开方之为人也,慧以给,不能久而乐始,可游于卫”:“其人性轻率,不能持久,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故曰乐始。使此人游于卫,诱动之,令归于齐也。”“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出自《诗经·

大雅·荡》。^[28]

(四) 篇名解题

解题是目录学的专用语。《四库全书总目》谈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时说:“其例以历代典籍分为五十三类,各详其卷帙多少,撰人姓氏,而品题其得失,故曰解题。”^[29]关于解题的作用,四库馆臣曰:“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籍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籍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资。”^[30]此处借用“解题”一词,意指尹知章《管子注》中对篇章标题的释义,姑且称之为“篇名解题”。

先秦典籍中的文章标题,就其与文章内容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篇名与内容联系不大,只是摘取首句中的个别字词为题;另一种是篇名揭示了文章大意,多为对文章内容的概括。《管子注》中的篇名解题,大多是第二种类型。如《形势》篇解题曰:“自天地以及万物,关诸人事,莫不有形势焉。夫势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势必直,状危者势必倾。触类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宙合》曰:“古往今来曰宙也。所陈之道,既通往古,又合来今,无不苞罗也。”《枢言》曰:“枢者,居中以适外,动而不穷者也。言,则虑心而发口,变而无主者也。其用若枢,故曰枢言。”《小称》曰:“称,举也。小举其过,则当权而改之。”有时,尹知章对文中部分章节的小标题也作出解释,如《牧民》篇有“国颂”、“士经”两节,尹分别释曰:“颂,容也。谓陈为国之形容。”“士,事也。经常也。谓陈事之可以常行者也。”《九守》篇有“右主位”、“右主明”两节,尹分别释曰:“人主居位当如此。”“主明在于用天下耳目视听之。”篇名解题为我们把握文章主旨提供了参考。

不仅如此,尹知章还以篇名解题的方式记录了有关篇目的亡佚及补充情况。《封禅》篇解题曰:“元篇亡,今以司马迁封禅书所载管子言以补之。”《管子》86篇,其中10篇有目无文,而从《封禅》篇的解题可以看出,至迟在唐尹知章时,《管子》已亡佚了十一篇。现存的《封禅》篇只不过源于《史记》之文,并非《封禅》篇原貌。此种解题对于研究《管子》文本流传有重要作用。

三 《管子注》的总体评价

文字训诂是古籍注释的基础。训诂要“务平实,忌好奇”^[31],要尽可能避免增字、删字、易字为训。就整个《管子注》来看,尹氏仅在《牧民》篇中对两个字词作了改动后加以训释。可以说,他以尊重原始文本的客观严谨的态度给《管子》作注,为后世注家树立了榜样。尹知章在《管子注》中释义字词、串通文意、篇章解题,有许多是不刊之论。这些都为进一步的《管子》文本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管子》经历了多次传抄与刻印,其文本已与尹知章所见的古本出现了差异。此种情况下,尹氏之注便成为后世学者据以校勘原文、推测古本的依据。如《法法》篇“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尹氏在“此所谓擅也”下注曰:“擅,专也。君之所专为,在于国治,而民务积聚也。”清王念孙据尹注推测原文有衍字。他说:“此所谓擅也”,“谓”字后人所加。“所擅”“所患”,皆承上文而言,则“擅”上不当有“谓”字。尹《注》曰“擅,专也。君之所

专为,在于家国治,而民务积聚也’,则无‘谓’字明矣。”^[32]《大匡》篇“易禄可无斂,有可无赦”,尹氏注曰:“奸伪易禄者,既当罚其罪,可无斂其禄,然今所有罪必无赦之也。”王念孙认为原文有讹,他说:“当依上文作‘有罪无赦’,尹注云:‘今所有罪,必无赦之也。’即其证。今本‘罪’作‘可’者,涉上句‘可无斂’而误。”^[33]尹知章在注释文字中还记录了他见到的《管子》别本。如《立政》“刑余戮民不敢服纆”,注文曰:“一本作‘纆’。”《乘马》“十仞见水不大濂”,注文曰:“一本作‘大濂’,继也,预貯水也。”又如《枢言》“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门。”注文曰:“一本作‘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而闻也。’”以上所论说明,人们想要识见《管子》文本的早期面貌,尹氏之注是必不可少的文献资料。

杜佑见到《管子注》时,曾说“注颇浅陋”^[34],两宋之交的张焘说《管子注》“甚陋不可遍举”^②,南宋黄震亦曰“为之注释者,复多抵牾”。^[35]客观地讲,尹知章《管子注》在许多地方有待进一步推敲。如《牧民》篇有“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一语,尹氏对“恭祖旧”注曰:“谓恭承先祖之旧法。”后世学者多不认可这一训释。清王绍兰说:“鬼神、山川、宗庙皆对文,若以‘祖旧’为‘先祖之旧法’,非其例矣。‘旧’当读‘人惟求旧’之旧。《四称》篇‘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文义正与此同。是‘祖旧’谓‘先故之大臣’。祖即先,犹《般庚》‘乃祖先父’。旧即故,犹《春官·大宗伯》‘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故下云‘不恭祖旧则孝弟不备’(恭祖旧属君,孝弟属民)。孝对祖言,弟对旧言。《大学》所谓‘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也。”^[36]颜昌晓亦曰:“祖谓宗亲,旧谓故旧。《论语》‘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37]相比较而言,王、颜二氏之训更觉妥贴。此外,尹知章对一些通假字、古字没有仔细分辨。如《内业》篇“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尹注曰:“调其宫商,使之克谐,气自来也。”显然是读“音”如字。此处的“音”字实“意”之借字。《小问》篇“泽命不渝,信也”,“泽”字为古“释”字,意为“舍”。尹氏将其释为“恩泽”,误矣。

虽然尹注《管子》存在诸多可商讨之处,后世注家的进一步校释却离不开它。明刘绩的《管子补注》正是充分利用了《管子注》的研究成果。四库馆臣在提到《管子补注》时说,“绩本之以作是注,故于旧解(指《管子注》)颇有匡正。”同时,他们又不得不认为,“古来无他注本。明刘绩所《补注》,亦仅小有纠正,未足相代。”^[38]自刘绩以后,对《管子》作训释的学者,清代如王念孙、王绍兰、俞樾、戴望,近现代如章太炎、张佩纶,海外学者如籍饴彦博、安井衡,他们对《管子》文本的深入研究,都是建立在尹知章《管子注》所取得的成就之上的。郭沫若在《管子集校·叙录(一)》中说:“《管子》书号称难读……唐中宗神龙年间国子博士尹知章曾为之注,有筌路蓝缕之功。”^[39]

总之,从研究史的意义讲,尹知章为《管子》作注,标志着对《管子》深入细致的文本诠释的开始。尹氏以为《管子》作注的形式不仅促进了它的文本传播,扩大了它的接受

群体,也奠定了以后《管子》注释体文本研究的基础。

注释:

① 荷兰学者范德龙持此说,转引李克(W. ALLyn Rickett)《管子引得导言》(INTRODUCTION TO A CONCORDANCE TO THE KUAN-TZU),见艾文博主编《中文研究资料中心研究资料丛书》之《管子引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之后得到《管子》研究者的多数认同。

②③ 以下论述中,凡此类举例性质的文字,均以四部丛刊《管子》为底本。一般只出现篇名,不再标明《管子》。

[参考文献]

- [1] 罗根泽. 罗根泽说诸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288.
- [2] 黎翔凤. 管子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04. 3.
- [3] [22] 章学诚. 文史通义[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167. 5.
- [4] 魏征等.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3. 1003.
- [5] [13][29][30][38]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847. 847. 730. 730. 5.
- [6] 巩国国. 《管子》佚篇亡佚时间考[J]. 管子学刊, 2007, (3): 12-13.
- [7] [19][20][21] 刘昫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4974-4975. 4974. 4974. 3164.
- [8] 欧阳修等.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1531-1532.
- [9] [18] 马端临. 文献通考[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1738. 1738.
- [10] [12][34] 孙猛. 郡斋读书志校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491. 491. 491.
- [11] 郑樵. 通志[M].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797.
- [14] [17][36][37][39] 郭沫若等. 管子集校[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6. 1137. 1137. 4. 4. 1.
- [15] [16] 张因也. 《管子》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 2006. 33. 33.
- [23]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90. 397-398.
- [24] 阮元. 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119.
- [25]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2907.
- [26] [35] 文渊阁四库全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27]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 1961. 317.
- [28] 周振甫. 诗经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450.
- [31] 郭在贻. 郭在贻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517.
- [32] [33] 王念孙. 读书杂志[M]. 北京:中国书店, 1985. 83. 91.

(下转第98页)

萍:你是谁?

鲁侍萍: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曹禺:《雷雨》)

(六)语境误用型

表达者有意无意地使用特殊语境,使其与听话者之间的距离或亲密化(距离拉近),或疏远化(距离拉远),或中立化(距离拉近或拉远),往往造成误用型语境移位。

例10:护士看到一个病人在病房喝酒,走过去对他说:“小心肝!”病人微笑着说:“小宝贝。”

病人利用动词转化成名词的方式误用语境,有意对护士的话语意思加以主观歧解,使语境移位,成功拉近了与护士间的距离,并间接表达了谢意。

四 结束语

对语境移位的定义与分类,使言语交际中的言辞和语境互为参照物,既以语境为轴心来研究言辞对语境的适应,又以言辞为轴心来研究如何利用、改造和创造语境,有效推进言辞展开,提高言辞表达效果,增进对言语交际意义的理解。这种使语言学研究从相对封闭、静态、外在、给定、与语言相分离对立的语境构建转向更开放、动态、交互、内化、生成、与语言互嵌交错的语境构建^[7],有利于人们分析认知语境与具

体言语交际意义的内在联系,清楚认识语境的本质特点和内在规律。

语境移位是语境的动态性与静态性的有机统一。它从语境移位的认知心理机制入手,揭示了认知语境的基本理论——语境移位变化的基本规律,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语境动态研究的理论,为现代语境学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 裴文. 现代英语语境学[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 [2] Dan Sperber and Deirdre Sperber, D&D · Wilson. Relevance.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
- [3] 莫莉莉. 情景会话中的语境构建[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 11.
- [4] [5]王丽群. 语境移位及其语用功能——司法语篇分析[D].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 [6] 冯广艺. 汉语语境学概论[M]. 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
- [7] 许力生. 语言学研究的语境理论构建[J]. 浙江大学学报,2006,(4).

Context Displacement: Its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WANG Li - qun, BAI Jie - ho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defines "Context displacement" and divides it into twelve types, which tries to reveal the basic theoretical question of cognitive context, the basic law of context displacement, from the angl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This will certainly supplement the theory of dynamic context research to a certain degree and supply the study of Modern Contextology with a complete brand - new thought.

Key words: context displacement;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上接第88页)

Three views on Guan Zi Zhu

GENG Zhen - do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Guan Zi Zhu is an important book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Guan Zi.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related authors, the number of volume and notes of "Qing Zhong" about Guan Zi Zhu, analyzes its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gives a trying comment on its position in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Guan Zi.

Key words: Guan Zi Zhu; author; number of volume; Qing Zhong; notes; position